

外教社翻译研究丛书

Comparative Aesthetics of
Translated Works of Shakespeare

莎士比亚翻译比较美学

奚永吉 著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外教社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I046/15

2007

外教社翻译研究丛书

Comparative Aesthetics of
Translated Works of Shakespeare

莎士比亚翻译比较美学

奚永吉 著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外教社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莎士比亚翻译比较美学/奚永吉著.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6

(外教社翻译研究丛书)

ISBN 978-7-5446-0242-6

I. 莎… II. 奚… III. 莎士比亚, W. (1564~161

6)—戏剧文学—翻译—美学—研究—汉、英

IV. I561.073②H315.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17817 号

出版发行: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上海外国语大学内) 邮编: 200083

电 话: 021-65425300 (总机)

电子邮箱: bookinfo@sflep.com.cn

网 址: <http://www.sflep.com.cn> <http://www.sflep.com>

责任编辑: 李健儿

印 刷: 常熟市人民印刷厂

经 销: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开 本: 890×1240 1/32 印张 41.375 字数 1500千字

版 次: 2007 年 7 月第 1 版 200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3 100 册

书 号: ISBN978-7-5446-0242-6 / H · 0103

定 价: 72.00 元

本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向本社调换



奚永吉 江苏武进人,1933年生,1954年南京大学西方语言文学系英国语言文学专业毕业;执教于江苏教育学院外语系,曾任教授、翻译教学研究室主任;受聘于南京大学外语学院双语辞典研究中心、南京大学金陵学院英语系、三江学院英语系;撰写论文有:《〈管锥编〉比较艺术锥指》、《翻译的美学内涵》、《中西诗歌意象说举隅》、《人物性格特征的审美探索——对〈儒林外史〉与〈弃儿汤姆·琼斯的历史〉的美学比较》、《“文如其人”俟解》、《〈尤利西斯〉两译本审美比较》等;著撰比较文学以及文学翻译美学研究方面的专著有:《中外文学因缘录》(25万字,1991年出版)、《翻译美学比较研究》(30万字,1993年出版)、《文学翻译比较美学》(81万字,2001年出版)。《文学翻译比较美学》一书列入国家“十五”重点图书出版规划,为《中华翻译研究丛书》之十二;2001年6月,获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总署颁发的第五届全国优秀外国文学图书奖一等奖;同年8月,又入选第五届国家图书奖评奖提名书目。

To my adored, beloved and cherished Celine I dedicate this book in token of affection and gratitude.

... What mankind have long possessed they have often examined and compared; and if they persist to value the possession, it is because frequent comparisons have confirmed opinion in its favor.

... so in the productions of genius, nothing can be styled excellent till it has been compared with other works of the same kind.

— Samuel Johnson

The worst way of interpreting Shakespeare is to say he meant this and just this, and to give a formula.

— Alexander Anikst

Listen to Shakespeare and don't listen to the critics. You don't need to understand every word.

— Louis Marder



总 序

翻译研究是不是一个学科,翻译有没有“学”,现在不应该再费时论争了。董秋斯 1951 年就提出要建立翻译学,要写出两部大书,一部是《中国翻译史》,另一部是《中国翻译学》。苏珊·巴斯奈特(Susan Bassnett)和安德列·勒菲弗尔(André Lefevere)在为《翻译研究丛书》写的总序中第一句就宣称:“The growth of Translation Studies as a separate discipline is a success story of the 1980s.”(1993) 我国 1979 年就开始招收翻译专业的硕士研究生,1986 年国务院学位办公布了首批“翻译理论与实践”(二级学科)的硕士点,现在已有一大批以翻译研究为学术方向的硕士生和博士生,1989 年以来,国家社科基金和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都陆续设立了一些翻译研究项目,1992 年国家技术监督局发布《学科分类与代码》,把翻译学正式定为语言学(一级学科)中应用语言学(二级学科)之下的一个三级学科。虽然这个学科定位还不够科学,但这个学科的存在已被公认。这说明学科的产生和发展不是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它是随着社会的进步和人类认识水平的提高而产生和发展的。

近 20 年来,这个领域的国内外学者都在努力加大研究力度,拓展研究领域,深化研究层次,陆续出版了不少翻译学研究的新成果。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为满足国内翻译教学的需求并推动这个学科的发展,经过精心选择,引进了一套“国外翻译研究丛书”(现已出版 29 种),这在我国翻译界还是第一次。这套丛书在翻译教学和研究中已经并将继续发挥它的重要参考和借鉴作用。

但是引进与借鉴不是目的,我们的目的是结合我们自己的翻译研究和教学实践进行新的创造。怎样创造?许多学科的发展史证明,要创造就要中外结合。怎么结合?中国学术史告诉我们,要结合就要以自己的



研究为根基,以国外的研究为参照,借鉴其理论与方法,改造和创立基本范畴,建立新的范畴系统。这个以自己为主的中外结合的原则就是学科建设的方针,也是我国翻译研究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对一个学科的发展来说,引进国外的理论和方法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要结合我们的翻译实践、翻译教学与研究,写出与我们自己的实际密切结合的论著。国内已经出版了一些这样的著作,对翻译学的建设起到了某种程度的推进作用,功不可没。但从理论的系统性和研究方法的科学性上来说,我们还没有一本多数人认可的《翻译学导论》。此外,在中国传统译论的继承性研究、外国译论的借鉴性研究、翻译实践(包括翻译教学实践)中新问题的探索性研究、相关学科(如文化、心理学、语言学、文学、社会学、哲学等)的吸融性研究以及方法论的多层次研究(包括本学科的和相关学科的)等几个重要领域,也都缺乏高水平的系统研究的论著。

为了进一步推动翻译学的研究与发展,满足这个学科研究生教育的教学与研究的需求,我们特别组织国内专家撰写以翻译学学科本体研究为主的系统的理论性论著——“外教社翻译研究丛书”。在筹划此套丛书时,我们了解到中山大学“985”学科建设项目也正组织编写“中山大学翻译研究丛书”,我们很高兴把他们的这些选题纳入到“外教社翻译研究丛书”中来。本丛书是一个开放性的系列,我们撰写、约稿的原则是:(1)翻译研究类的学术专著,充分反映本领域国内外最新研究成果;(2)追求理论的系统性和学术观念与研究方法的创新性,目的是对翻译学的发展和翻译人才的培养起重要的推动作用;(3)用汉语撰写。读者为高等学校翻译以及其他相关专业的教师、研究生,翻译学界、语言学界以及文学、文化、哲学与心理学等学界的翻译工作者和爱好者。

翻译是人类跨语言跨文化的交流活动,是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最重要的手段和途径之一。I·A·理查兹(Ivor Armstrong Richards)曾说,翻译很可能是宇宙进化过程中产生的人类最复杂的一类活动。它的复杂性必然对我们的研究构成挑战,要求我们的研究不断拓展,不断创新,不断深化。从古至今,大体说来,人类对翻译的研究已有了直观经验式的、文艺学的、语言学的、文化学的等多种视角和方法。我们相信,我国的学者一定会同世界各国的同行一道,对人类这项重要而复杂的活动不断加以探索,进行多层面多角度的研究,为这一学科的发展做出我们自己的贡献。



序

奚永吉先生,是我老师辈的学者,先是有幸拜读他论翻译美学的书,后来通过书与他相识、相知,成了忘年交,转眼就是十几个年头过去了。在我的记忆里,我们每次见面,时间长短不一,短如在南京大学校园相遇匆匆交谈几分钟,长如在办公室、在书房交流心得,一谈就是数个时辰,每次谈的只有一个话题,那就是翻译。

奚永吉先生是一个非常执著的学者。七十多岁的老人,退休都十几年了,但还是老习惯,心系教学与科研,白天教书,晚上研究,教的是翻译,研究的也是翻译。他搞教学,是因为如今高校大扩招,教学资源匮乏,培养学生需要像他那样有经验有责任心有专长的老师;他做研究,是因为他心里实在放不下翻译,对翻译的不断思考与探索,已经成了他的生命的意义所在。

奚永吉先生不仅执著,而且专一。别的不说,单就他近十几年来所发表的有关翻译研究的成果而言,只要看一看他的专著和论文的题目,就不难发现他的研究范围十分明确,研究的目标始终如一,整个研究基本上是围绕着“翻译美学”而展开:从《翻译美学比较研究》到《文学翻译比较美学》,再到凝聚着他数十年心血的研究力作《莎士比亚翻译比较美学》,一条红线贯穿始终,藉“比较”之法,探美学之理,觅翻译之道。

《莎士比亚翻译比较美学》的完成,对奚永吉先生来说,是实现了人生的一个梦。半个世纪前,奚永吉先生考入南京大学西方语言文学系,攻读英语语言文学专业,教授“理论文与文艺文选读”的郭秉稣教授在一次授课时曾对英语专业的学生说:“学英语语言文学专业的人,若不懂一点莎士比亚,岂不是枉为一生。”这句话,深深地刻在了奚永吉先生的心底。半个世纪以来,奚先生读莎士比亚,思莎士比亚,解莎士比亚,一步步走近莎士比亚,最终由翻译之门而入,把目光投向了莎士比亚在中国的生命历程,悉取莎士比亚翻译各家之所长,探究莎士比亚翻译之道,以



求莎士比亚翻译之真,而其所本之宗旨,则“尤在美之一字”。半个世纪的追求与探索,如今终于有了结晶,有了奉献给学界同行的这部《莎士比亚翻译比较美学》,奚先生感慨道:此生,足矣!

《莎士比亚翻译比较美学》凝聚了奚永吉先生半个世纪的努力与心血,有着多个层面的重要价值。首先是理解莎士比亚的独特路径。有人说,古今中外无数文学作品中,论受到举世注重的程度,论翻译和研究的质和量,除了《圣经》之外,莎士比亚的戏剧是数一数二的(见周兆祥《汉译〈哈姆雷特〉研究》引言)。此言不虚,几个世纪以来,在西方各国,最优秀的作家、诗人、批评家,几乎都谈过莎士比亚,这样一来,要把莎士比亚说出点新意来,恐怕是非常困难的。奚永吉先生有感于此,他从歌德《说不尽的莎士比亚》一书中得到启迪,更从古今中外的戏剧史中悟出“趣”之特殊重要性,认为“纵观莎士比亚所有作品,均可以一个‘趣’字提挈其中审美意蕴:在他的笔下,文体、语言、意象、无不以‘趣’擅胜”。先生以“趣”识莎士比亚,解莎士比亚,再以“趣”立目,探究莎士比亚之汉译,为人们理解莎士比亚,走近莎士比亚,又开辟了一条新的路径。

《莎士比亚翻译比较美学》的价值,还在于为译学研究拓展了新的领域。莎士比亚的影响是巨大的,但我们知道,莎士比亚的生命在时间上的延伸和空间上的拓展,在很大程度上是靠了翻译。在这个意义上,数百年来莎士比亚对世界各国的影响,也就是莎士比亚的翻译对世界各国的影响。奚永吉先生看重的正是这一点,他探究的重点不是莎士比亚的原作,而是其作品在中国文化语境中是如何翻译,如何保存其精华,又是如何拓展其生命的。全书以“美”字为着力点,探讨翻译之难,审视翻译之技,比较翻译各家之长,一步步深入,把握莎士比亚汉译之灵魂所在,不仅开拓了文学翻译研究的疆域,更具有文学翻译研究方法论层面的参照意义。

以上两点,是我初读《莎士比亚翻译比较美学》的粗浅体会。先生看重后辈,嘱后学为其作序,我愧不敢当,只是想借此机会,向奚永吉先生的为人与为学表达我深深的敬意。

许 钧

2005年10月5日于金陵



引

言

天下文章当以趣为第一，莎译同然。

在古今中外的戏剧史上，剧作家历来视“趣”为其机杼。如明曲家何良俊曾以“蕴藉有趣”称美郑光祖《伯梅秀》；徐奋鹏亦以其“词调原极清丽，且多含有神趣”不能赞一词。更值得指出的是，茅暎对明代戏剧家兼剧作家汤显祖的赞语中，多次标举“趣”一词，如“极闲、极趣，非临川不能为”、“寻常学问，用来都趣，临川的是趣人”等等。但对“趣”的解读，又可见诸明代戏剧评论之篇什，大有凡有所评，必涉“趣”字之概，如陈继儒对《棣林寄迹》的评语是“无谑不成戏，无趣不成文，游戏三昧，此篇矣”；对《招商谐偶》的评语则为“曲曲出奇，折折呈趣，诸情调都无此风流”。除此之外，对于戏剧中如何化炼前人成说，翻新见奇，别出妙理，评论家亦常以一个“趣”字概之。如祁彪佳评《东郭记》之“掀翻一部《孟子》，转转入趣”；又如在评论剧作家在设立意境时，总以是否能臻“无境不入趣”之妙，而不致使观者或读者“便觉趣味不长”衡之。凡此种种，对莎译以及莎译者而言，若以此比观，当不无启迪。

邻壁之光，堪借照焉。莎士比亚作品之中，亦洵称“无谑不成戏，无趣不成文”，按此同揆，莎士比亚翻译中岂可“绝无生趣”？纵观莎士比亚所有作品，均可以一个“趣”字提挈其中审美意蕴：在他的笔下，文体、语言、意象，无不以“趣”擅胜；各种人物亦无非趣人，状物叙事亦无非趣事。对于莎译者而言，可借鉴清初黄周星一说：

制曲之诀，虽尽于“雅俗共赏”四字，仍可以一字括之，曰“趣”。……则一切语言文字，未有无趣可以感人者。^①

此说是对“制曲”而发，但从广义而言，亦适用于戏剧整体。对于戏剧翻译，乃至莎士比亚翻译，亦有可采之处。为此，笔者踵而效之，亦以一个“趣”字，提挈一尽，并以此立目，贯穿全书。

① 黄周星[清]：“制曲枝语”见郑奠、谭全基(编)《古汉语修辞学资料汇编》第715页。



自 序

关于莎士比亚,人们已经说了那么多话,以致看来好像再没有什么可说的了;可是精神有一特性,就是它永远对精神起着推动的作用,这一回我要从几个方面来观看莎士比亚,首先作为一般的诗人,随后把他跟古人和近人相比,最后作为特殊的舞台诗人来谈。^①

以上节引歌德于1829年所撰《说不尽的莎士比亚》一文中之首段。语本泛泛,乍读初无所觉,咀嚼既久,方见其大旨。歌德此说,历来世人释之者不一说,取之者不一人,但事实证明,时隔100多年后,对莎士比亚尚未说尽,从不息喙。尤其对于莎士比亚翻译正方兴未艾,足见并非“看来好像再没有什么可说的了”;更有甚者,歌德在此说后段又别出一层,补完题蕴,实有不尽之义,所以又拈出“我要从几个方面来观看莎士比亚”,此说字少意多,辞近旨远,足见歌德深知邻壁之明,他不仅将莎士比亚区分为“一般诗人”与“特殊的舞台诗人”审美特征,而且又旁见侧出地对莎士比亚两种审美表现形态——“文学形态”的莎士比亚戏剧与“表演形态”的莎士比亚戏剧作了比较。与此同时,歌德又拈出将莎士比亚与“古人与近人相比”,即跨时代比较。由此可见,歌德此说已蕴含以比较美学思维,对莎士比亚作了跨时空的比较研究,应该肯定,此说已为后世一开以比较美学思维研究莎士比亚之先路。

与此同揆,对莎士比亚翻译之研究,亦莫能外。治译莎士比亚作品,不仅应作跨时代之比较,而且涉及中西不同文化之间的跨文化比较,因此译者亦应以比较美学思维,综合东西古今美学思想,探索莎士比亚翻译中所存在的美学价值。正如钱钟书所指出:

^① 杨周翰(主编):《莎士比亚评论汇编》(上册)第297页。



我们讲西洋,讲近代,也会不知不觉远及中国,上溯古代。人文科学的各个对象彼此系连,交互映发,不但跨越国界,衔接时代,而且贯穿着不同的学科。^①

在对莎士比亚翻译的比较美学探索中,莎译者必须具有“在运用比较方法上的自觉意识”^②而且能在“无意之间已经几乎自动地在与类似作品进行比较”^③。正如我国著名翻译家许渊冲先生在治译中国古典名著《西厢记》时,运用比较方法与治译莎士比亚名剧《罗密欧与朱丽叶》作了美学比较,两例并见,得以观其会通。以此为例,莎译者在治译过程中,不应孤立地思考美学问题,而是应以比较美学思维,将莎士比亚翻译,置于世界文化视野,以及历史发展的脉络中进行探索与比较,打破时空界限,不分古今东西,以处于一个平等地位的美学思想进行思考、判断与阐释,从而寻求对莎士比亚审美本体知识的深刻理解与把握。著名美籍华人叶维廉曾指出,以比较美学思维进行诗歌翻译,“目的不在提供一种理想的翻译,而是由此进入原诗中的美学问题”。^④对于莎士比亚翻译,亦应作如此观。在此,再节引他一段有关论述。

……在跨文化、跨国度的文学作品及理论之间,寻求共同的文学规律(Common Poetics)、共同的美学据点(Common Aesthetic Grounds)的可能性。在这个努力中,我们不随便信赖权威,尤其是西方文学理论的权威,而希望从不同文化、不同美学的系统里,分辨出不同的美学据点和假定,从而找出其间的歧异和可能汇通的线路;亦即是说,决不轻率地以甲文化的据点来定夺乙文化的据点及其所产生的观、感形式、表达程序及评价标准。^⑤

此论虽短,大有可采。除阐明以比较美学思维,打破空间上的中外,时间上的古今,对中外不同的文学现象与文学理论进行跨文化、跨国度的比较外;同时,最为重要的是,又强调在这种比较研究中“不随便依赖权威,尤其是西方文学理论的权威”,而是力主“从不同文化、不同美学的系统里,分辨出不同的美学据点和假定,从而找出其间的歧异和可能汇通的线路”。引而

① 钱钟书:《诗可以怨》。

② 霍斯特·吕迪格:“比较文学的内容、研究方法和目的”,见张隆溪(选编)《比较文学译文集》第19页。

③ 同上。

④ 叶维廉:“寻求跨中西文化的共同文学规律”,见《叶维廉比较文学论文选》第54页。

⑤ 同上,第20页。



伸之,在研究与比较莎士比亚翻译中,也不应“随便信赖权威,尤其是西方文学理论的权威”而应“从不同文化,不同美学的系统里,分辨出不同的美学据点和假定”——此说最是有见。就莎士比亚翻译研究而言,按此同理,译者与评者亦应借助于不同文化的“邻璧之光”,即以西方传统文学理论与美学原则观照中国文学理论与文学现象的同时,亦应以中国传统文学理论与美学原则反照西方文学理论和文学现象。正如我国著名学者钱钟书在跨越国界、衔接时代,贯穿不同学科的比较文学研究中,并不单纯偏嗜以西方传统文学理论来观照中国的文学现象,而是兼擅从我国古代史籍、文论、诗词,乃至笔记、传奇、小说中拈出片言只语,相互参比,交相发明,探索中西古今同贯共规的文学规律。对此不妨节引一例:对于德国美学家黑格尔所拈示的中国语文“不宜思辨”一说,钱钟书以中国古籍中的大量例证,阐发中国文字之灵活性与艺术性,以此印证中国语文可与西方语文“齐功比美”,以及“当使黑格尔自惭于吾汉语无知而失言者也。”^①除此再可拈示一例:我国著名戏剧家杨绛曾标举:“李渔的戏剧理论里,许多地方跟西方的戏剧理论相似。”^②此语正是这位戏剧家沟通古今,融合中外,对中西古今文心的互通比较所取得的研究成果。更值得一提的是,我国著名美学理论家吴功正又通过中西戏剧审美特性以及中西戏剧的舞台因素作了比较研究,认为中西戏剧在审美情趣上,两者的文化层次均有高低混合的现象,指出:“高层次上,中国戏剧的韵味并不亚于莎士比亚,所不同者,只是一者为唱,一者为说而已。”^③类例甚多,不更援引,详见后文有关论列。

本书接武前贤,立意于运用比较美学思维以及比较方法的自觉意识,借邻璧之明,取他山之石,对见诸不同时代、不同译者的莎士比亚翻译作品中的大量中外文学现象与非文学现象,进行比照,互相映发,从而探求其间的共同性与差异性。本书随文举例,并不拘一家,异译并存,尤对译体不同而其义俱通者,别标一例,以此阐明莎士比亚翻译中,尽管两种不同文化,不同语言,但在文辞、文法、文化上可以彼此互照,双向汇通。通过翻译主体的审美感知和传达,在译文中亦可衔接递代,约用撮取,在词义意旨上,毫无抵牾凿柄现象。细审许多莎士比亚翻译名家名流之笔下,在处理中西文学现象与文化现象中,完全取得彼此离方遁圆、思辨通同之工妙上,实有专美;同时,由于译者能与原著于词章义理上,心运同轨,所以才会于其译文中,出现

① 钱钟书:《管锥编》(第1册)。

② 杨绛:“李渔论戏剧结构”,见张隆溪等《比较文学文集》第53页。

③ 吴功正:《中国文学美学》第747页。



矜持尽化、语迹俱融的入化之笔。一言以蔽之，莎士比亚翻译审美主体对莎士比亚原著中所体现出的中西文化共同的文学规律，即对于“文学现象中同一的东西”（列宁语）均应具有充分的审美认知与把握，惟此方能臻其妙，得其趣，探其美。

本书为探其美，无意于规摹前制，转相因袭，试图有异于目下一般论述莎士比亚翻译之篇什：或偏于说理，深废浅售；或重于表微，近于雕虫；或泥于考证，堕入训诂，或侈于评鹭，好为人师，力求能有别一表现。为达此旨，本书略有改张，变其纲目，以一“趣”字，提挈全书，详见前文引言一节，在此不赘述。与此同时，笔者亦试图以一“美”字，作为对莎士比亚翻译审美价值水平基本偏向，正如我国清代戏剧家吴梅所标举：“而唯一宗旨，则尤在于美之一字”（《论作剧法》）。本书之旨亦坐此。值得一提的是，为叙述上力求简便易读，别辟一径，除节引中外古今诗论、文论、剧论外，不先论理而先论例，以求理从例出，以实其理；不先求其理举而先观其会通，以求通而不滞，辞达意圆。但此书无意以“理论”矜长，更不侈谈所谓“理论体系”，而使本书沦为“多肉微骨”之“墨猪”。因此不拟搬弄任何理论名词，以此狂轰滥炸一番而自炫；再之，本书虽冠以“比较美学”，实以比较美学思维与观点论列莎士比亚翻译，但绝不是一本比较美学的学科理论书或教科书。因此，在此作一赘述，以免流于一癥，为人吹索，致使笔者难任其咎。

我国著名莎评家王佐良曾标举：“莎士比亚极为难译，因为他所写内容最广，艺术又最精。”^①此说虽属的论，但将起句“莎士比亚却极为难译”中之“难译”，变换组合为“译难”，同为一词，但如正反相背，顺序颠倒，则又是别一境界。目下莎士比亚已不独是“难（nán）译”，而且已成为译坛之“译难（nàn）”。同词异读，其义各别，所指两途，而后者正是本书论列之大旨所在。鉴于所谓“译难”，其底蕴涉及莎士比亚翻译各个层面，因而其具体内涵与表现形态自不相同，现举其中荦荦大者，以示其例：

（一）莎士比亚翻译审美艺术形态论难

我国传统戏剧理论早有“案头”与“场上”戏剧形态之分野。就莎士比亚翻译而言，莎剧翻译应以何种形态出之，亦涉此论。众所共知，中外古今戏剧分为“表演形态”的戏剧与“文学形态”的戏剧，前者以表演为本位，后者以文学为本位，即表演的戏剧与文学的戏剧等等分类，其审美特征不同，因此对译文的审美要求亦各异。有鉴于此，中外莎译家与莎评家多有论说。例如英国戏剧家阿·尼柯尔曾指出：“有一些戏剧家的剧本‘读起来’比‘演起

^① 王佐良：“一个莎剧翻译家的历程”见《中国翻译》（1990年第1期）。



来’好；另外一些戏剧家，如本·琼生，他的剧本则是‘演起来’比‘读起来’好。”^① 莎士比亚翻译，亦不例外。我国莎评家王佐良对莎剧之翻译所标举的审美要求是：

例如他写的既是剧，又是诗，这诗又是用作舞台台词的，理想的译文应是可读又不可演的。^②

与王佐良相近之说，尚可见诸英国作家兰姆如下一段论述：

莎士比亚的戏剧，比起任何别的作家，实在最不该在舞台上排演。因为里面有一部分并不属于演作的范围以内，与我们的眼、声、姿势，漠不相关。^③

两说虽有不类，但基本上同调。但作为莎士比亚翻译审美标准，笔者认为为绝不可视“可读又不可演”的莎士比亚翻译作品为“理想的译文”，更不可在治译莎士比亚剧作之初就已作如此观；与此相反，理想的“前理解”应是，力求使自己的译作成为案头场上两擅其美之上品。不妨聊举如下例，对其不同译文作一品玩：

For us and for our tragedy,
Here stooping to your clemency
We beg your hearing patiently.

(*Hamlet*, Act III, Scene II)

译文一：

为我们和我们的悲剧，
伏乞各位温和先生，
耐着性儿清听。^④

译文二：

我们如今上演这悲剧，
先得向诸位把躬来鞠，
请海量包涵，耐到终曲。^⑤

译文三：

今天悲剧上演，
谬承诸位赏脸，
还求海量包涵，
耐性把戏听完。^⑥

译文四：

今晚来献丑，上演悲剧，
先向各位来把躬一鞠，
请宽宏大量，看到结局。^⑦

① 阿·尼柯尔：《西欧戏剧理论》第93页。

② 王佐良：“一个莎剧翻译家的历程”见《中国翻译》(1990年第1期)。

③ 兰姆：《论莎士比亚悲剧是否合于舞台排演》。

④ 田汉(译)：《哈姆雷特》，见《田汉全集》(第十九卷)第108页。

⑤ 孙大雨(译)：《哈姆雷特》，见《莎士比亚四大悲剧》第90页。

⑥ 梁实秋(译)：《哈姆雷特》第107页。

⑦ 卞之琳(译)：《丹麦王子哈姆雷特悲剧》，见《卞之琳译文集》下卷第94页。



译文五:

这悲剧要是演不好，
要请各位原谅指教，
小的在这厢有礼了。^①

译文六:

今晚演悲剧，
恭请多赏脸，
耐心给听取。^②

译文七:

为了我们和我们的悲剧，
我恳求诸位施予仁慈，
请你们安静忍耐地听戏。^③

以上译文，孰为戏剧语言孰为文学语言；孰为表演形态，孰为文学形态；孰为“可读又不可演”，孰为不可读又可演，孰为不可读又不可演？殊难论定。寓目之余，必细加咀嚼，方可作出判断。但据笔者经眼所及，莎译作品“可读”与“不可演”者，虽为正反相背，但时见两者兼而有之，即既不可读，又不可演，而“可读”又“可演”者，百不一见；与此相反，莎译中不乏“不可演”亦必然“不可读”的例证。撮举名家笔下数例如下：

例一

Not he alone shall suffer what wit can make heavy and vengeance bitter; ...
(*The Winter's Tale*, Act IV, Scene IV)

译文一:

不光他一个人将遭受机灵所想得出来的最重要的和报复所施的最苦的刑罚；……^④

译文二:

凡是能想得出来的最毒辣、恶狠狠的惩罚并不是只落到他一个人头上就算了；……^⑤

上引两译文，虽出自异手，但用词数量差等，均为32字。值得一提的是，两译文的作者均为以诗体译莎的崇尚者。长句之病，实为诗家以及译诗者之厄。

例二

... but young Romeo will be older when you have found him than

① 朱生豪(译):《汉姆莱脱》，见《莎士比亚戏剧集》第562页。

② 林同济(译):《丹麦王子哈姆雷的悲剧》第83页。

③ 杨烈(译):《汉姆来提》，见《莎士比亚精华》第83页。

④ 孙大雨(译):《冬日故事》第126页。

⑤ 方平等(译):《冬天的故事》，见《新莎士比亚全集》第十一卷，第475页。